



—— 中國人民大學 ——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RUC Perspectives

思想评论

强世功：陆地与海洋

—— “空间革命” 与世界历史的 “麦金德时代”

2018年第5期（总第21期）

陆地与海洋

——“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强世功*

【阅读提示】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通过全球地理空间中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他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世界历史被划分为三个时代：欧亚大陆的亚洲时代、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是由于1900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以及今天面临的问题无疑受到这个时代格局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麦金德之后地缘政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没有突破麦金德提出的理论范式。中国的崛起不仅要具有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有全球地缘政治意识，不仅思考地缘政治战略之“术”，更要思考地理与人类历史的内在关联，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化之“道”。

【关键词】地缘政治、空间革命、麦金德、麦金德时代

*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且将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在 1900 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①

在 1904 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著名演讲中（以下简称“《枢纽》”），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开篇就以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这个历史划分标准无疑是以全球地理的探索和发现为标准。前哥伦布时代，人类文明集中分散在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彼此存在有限的联系。哥伦布时代就是以西方文明开展全球航海和探索进行地理大发现时代，经过四百年的努力将一个完整的地球展现在人类面前，从而使人类进入到后哥伦布时代。如果对比我们所熟知的、诸如黑格尔、马克思等大思想家们通过大部头的经典著作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在的划分，那就不得不说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划分，以至于这篇演讲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一道被看作是改变世界的“巨著”。^②

一个地理学家的演讲之所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麦金德对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在地理学界关于“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辩论中，发展出一套“政治

^①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9页。

^② 同上，“译者前言”。

地理学”，以期揭示出地理与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之间具有某种稳定且隐秘的内在法则。“《枢纽》”因此成为政治地理学的经典文献，麦金德也因此被看作是“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或“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开创者。^①

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政治地理学”都要探讨地理与政治之间互动的法则，这就意味着一个熟悉地理法则的地理学家能够为政治活动提供相应的战略性思考，从而让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活动中从盲目力量变成自觉力量。由此，在这门学科内部，或者人们在对“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这些概念的微妙使用上，就显示出这种内在的张力。^②一种趋向就是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理性、科学知识，这就意味着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影响。这种研究趋向强调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从而探讨地理法则的客观约束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甚至上升至地理“决定论”与“或然性”之间的哲学争论。这种趋向人们更多地称之为“政治地理学”，强调这门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要素。另一种趋向则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战略学科，强调用具体的地理学知识来服务于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等，由此政治地理学也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地缘政策”（geo-policy）或“地缘战略”

^① 在 1887 年发表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的演讲中，麦金德就从地理学科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地理学”这个概念，而将“政治地理学”的方法运用到对地缘政治的具体分析，则体现在其“1904 年演讲”中。而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 1897 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这部经典著作，而他的学生瑞典人契伦（Rudolf Kjellen）在 1900 年出版的《瑞典地理学导论》中发明了“地缘政治学”这个概念，并在 1916 年的《国家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著作中加以系统阐述。因此，麦金德、拉采尔和契伦都被看作是“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

^② 关于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内在张力，参见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一章、第三章。亦参见刘小枫：“地缘政治学和百年中国”，张广生主编：《中国政治学》，第二辑（即出）。

(geo-strategy)。①这种趋向人们更多地称之为“地缘政治学”，后者强调这门学科的“政治学要素”。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趋向，一方面麦金德始终强调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地理学”基础，从而在地理学科的知识传统中定位“政治地理学”，但另一方面麦金德的著作又具有很强的地缘战略意识，旗帜鲜明地用政治地理学服务于大英帝国以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无论是1904年的“《枢纽》”、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学的重建》（下称“《重建》”），还是1943年发表的“环形世界与人类和平”（下称“《和平》”），其重心在于提出具体的地缘战略。因此，人们对麦金德的理论关注也普遍集中在其地缘战略思想。比如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2003年年会上组织的纪念“《枢纽》”发表一百周年的专题研讨会中，麦金德的传记作者 Brian Blouet 提交的论文讨论麦金德“1904年演讲”的地缘经济背景，即面对美国和德国的崛起，麦金德主张巩固大英帝国联盟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护英国在全球的优势。Pascal Venier 的论文考察当时英国所处的国际政治背景，认为当时英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决策者普遍担心与俄国的“大博弈”所带来的威胁和如何防卫印度问题，因此“1904年演讲”体现了那个时代英国战略精神，但也因此忽视德国崛起带来挑战。Gerry Kearns 的论文考察了当时英国的知识界和科学界的情况，认为“1904年演讲”体现了那个时代地理学教育中普遍流行

① 将德语中的 geopolitik 这个概念翻译为 geopolitics 的时候，意思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德语中的 politik 本身就有“政策”（policy）的含义。关于这个词的翻译和理解，参见纽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9-431页。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将自然、环境、种族和大英帝国的塑造联系在一起，从而给全球描绘了一个“竞争”而非“合作”的前景。Nick Megoran 的论文是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运用于分析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缘政治。Leslie Hepple 的论文讨论如何用麦金德的理论来分析拉美，并将玻利维亚看作是拉美的“枢纽”。^①而在 2004 年 12 月，乌兹别克的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University of World Economy and Diplomacy）举办了纪念“《枢纽》”发表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集中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分析上，尤其关注后冷战以来这个概念在中亚的运用。^②国内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基本上集中在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思想上，将其看作是陆权理论的代表人。^③

然而，麦金德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地缘政治家，他也不喜欢“地缘政治家”和“地缘政治学”这些概念。“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保卫大英帝国与民主，提升教育和地理学。他的地缘政治主张不过是他在更大的世界中偶尔展现出将想象力与洞见运用于阐述历史与地理互动中所体现出的价值。”^④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对政治地理学本身的理解，尤其他从政治地理学出发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作的划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要旨所在。众所周知，在麦金德地缘战略思想中，一个最大的

^① 关于这次会议论文的综述，参见 Klaus Dodds and James D Sidaway, Halford Mackinder and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4, Dec. 2004, pp. 292-297。

^② 关于这次讨论会的综述，参见 Halford Mackinder’s ‘Heartland’- a Help or Hindranc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1, No.2, Jun. 2005, pp. 177-178。

^③ 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麦金德的专著就集中在地缘战略思想上，参见方晓志：《麦金德地缘战略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相关的研究亦可参见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张文木：“‘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④ 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Clarendon Press · Oxford, 1982, p. 147.

疑问就在于为什么在 1904 年的“《枢纽》”中预言俄国作为英国的主要对手挑起一场全球大战，却没有想到十年后德国作为英国的主要对手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因此质疑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有人则为麦金德的地缘战略辩护。^①事实上，要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构想和对未来的预言，必须把握他对空间地理格局变化的总体判断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历史进程的独特划分。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通过全球地理空间中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实际上构成对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史学观念的一场革命，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本文第一部分）具体而言，麦金德从“空间革命”的角度看待“地理空间”上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化，并依此考察“地理空间”的变化对人类“政治空间”的支配性影响，从而世界历史被划分为欧亚大陆的亚洲时代、海洋世界的欧洲时代，以及 1900 年之后世界历史进入大陆与海洋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麦金德时代”。（本文第二至第四部分）我们之所以将 1900 年之后的世界称之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在于强调 1900 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因此，我们对这个时代（包括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时代）的理解不能囿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解，而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唯有从这个

^① 相关讨论参见 Colin S. Gar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pp. 9-25.

角度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道路选择的地缘历史背景。而这恰恰是“麦金德时代”带给中国的重要遗产。（本文第五部分）另一方面，“麦金德时代”这个概念也在于提醒我们，麦金德之后西方地缘政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直到今天的地缘政治学说至少就地缘政治战略的思考而言，基本上是在麦金德的理论范式下展开的思考。麦金德之所以超越其他地缘战略家就在于麦金德思考的是地理、自然与人的自由之间内在关联，思考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普遍之“道”，而非简单的地缘战略之“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不仅要关注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全球空间意识，不仅要关注地缘战略，更要关注人与地理互动所形成的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必修课。而这一切都要从麦金德开始。（本文第六部分）

一、地理空间与全球历史：西方史学观念的革命

从古希腊开始，地理始终与政治历史叙述纠缠在一起，可以说地理与历史乃是在一个思想母体中成长起来的。然而，学科最终的发展，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地理学在科学的影响下与历史学、政治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分道扬镳，以至于在后来的地理学看来，早期与历史、文化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则属于早期“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的范畴。而地理学则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尤其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地图制作技术发展以及现代地质学发展，用现代科

学技术来研究地理问题使得地理学逐渐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形成了“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尤其服务于地理大发现推动的全球地理探险。随着 19 世纪地理探险区域的结束，地理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深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提出了“政治地理学”，探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地理环境力量与人类社会政治支配力量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地理环境就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政治活动发挥着作用。如果你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地理环境的力量，从而在政治活动中善加利用，那么政治地理学就变成理性科学。从“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演讲的题目就清楚地展现出麦金德试图在“历史”与“地理”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

然而，在对这篇演讲的解读中，人们普遍关注其中关于“地理”乃至地缘政治战略思想，而忽略了他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少有的例外是刘小枫先生从历史文明观的角度来探讨麦金德的理论中隐含的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与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之间的张力，并以此为线索来系统解读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①如果说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贯穿麦金德思想的始终，那么关于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主要体现在“《重建》”中。小枫先生正是以“《重建》”中提出的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出发，关注的重点不仅是麦金德的地缘战略，而且关注麦金德试图通过政治地理学来开展国民教育，以弥补西方民主国家因过分陷入理想主义的不足，即在用修昔底德式

^① 刘小枫：“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思想战线》，2016 年第 5 期。

的现实主义史观来弥补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的内在不足。^①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麦金德在“《重建》”中的民主理想，这种民主理念更接近于英国式的均衡理念。麦金德在其中试图寻求人类和平的“平衡之道”，包括陆地与海洋之间空间地理布局的平衡，世界强国组织为“国际联盟”的平衡，甚至农业与工业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协调发展的平衡。^②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区分更接近于陆地与海洋两种地理的惯性所形成的两种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与启蒙思想家眼中的普遍历史观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划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麦金德的历史观实际上颠覆了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普遍历史观。

无论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历史观，还是启蒙时代普遍主义的历史观，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西方中心主义的重点在“西方”，即这首先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主义，即以欧洲（包括后来的北美）地理空间中发生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展开的轴心。而“西方人”与“东方人”、欧洲与亚洲这样的划分本身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起来的“自我”与“他者”的产物，由此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始终以西方地理空间为中心，建构起从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连续展开的人类历史。这种历史叙事至今左右人们的头脑，以至于“言必称希

^① 事实上，刘小枫先生这两篇文章对地缘政治学的关注重心并非在于地缘战略，而在于基于地缘基础的国家与文明的建构，因此他始终强调以地缘政治学作为开展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以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教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教育进行潜在对比。参见刘小枫，同上；刘小枫，同前注4。

^② 麦金德，同前注13，第六、七章。

腊”甚至成为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常见方式。这种贯穿西方始终的人文主义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东方历史从属于或依附于西方历史，由此西方历史是连续发展的历史，而东方历史则不仅是碎片化的历史，且很大程度上是神秘、想象、甚至病态的历史。因为东方国家和民族只有与西方发生关系并进入到西方人的视野中，才偶尔吸引他们的目光，零星地进入他们的历史。当他们不能理解东方的时候，只能通过想象来建构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神秘东方，而这样的东方显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的想象。无论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还是印度王朝和中华帝国，在欧洲人历史叙述中始终以一种碎片化的想象，有时是理想化的想象，有时是妖魔化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西方人才具有完整的历史，东方人不过是作为想象的碎片编制在西方人建构起来的历史观念中。

其二，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优越性，这不仅体现在关于政体学说中建构起来的自由民主政体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抗，而且体现在普遍历史观念中文明与野蛮的对抗。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近代西方的兴起，全人类的历史逐渐进入到西方人的视野中。西方人通过政体学说将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对立起来。欧洲国家要么是以古代雅典城邦为代表的民主政体，要么是以近代英国所代表的自由政体，这些政体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自由、平等，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商业、繁荣与和平。而东方亚洲国家无论在现实中有多少不同的政体，但都被冠之以“东方专制主义”，不仅用来描述中国的君主官

僚制，也用来描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体，还用来描述中亚的游牧王朝。总而言之，专制政体意味着君主的任性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奴役、愚昧、战争和压迫。^①

与此同时，西方基督教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哲学开始建构自身的普遍历史，从而将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看作是普遍精神展开的过程。整个东方文明和东方历史被置于人类普遍历史的开端，唯有西方文明才真正代表了人类普遍历史最终实现的方向与目的。^②而这种普遍精神的历史展开又获得来自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支撑，从而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划分来建构普遍历史，^③由此形成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类思想智识成长相一致的普遍历史观念。启蒙时代西方人所热衷的普遍历史无异用来理解和解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东方游牧民族被看作是野蛮民族，亚洲农业民族被看作是未开化民族，而唯有西方海洋商业民族被看作文明民族。由此，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也从早期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划分也逐渐转向思想观念、文化风俗、经济生产方式乃至种族的划分。种族主义也由此兴起，西方白种人被看作是文明民族，黑人和棕色人种理解为野蛮民族，而黄种人理解为未开化民族。

可见，西方的人文历史观始终以东方亚洲文明作为外在的“他者”或“敌人”来建构起其内在的主体性。这种历史观不仅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文明长期受到东方文明的入侵和压迫，原因就在于东方的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

^③ 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这种普遍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它是对黑格尔普遍历史观念的颠倒。

野蛮或者专制政体的君主野心和个人任性，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西方人能够殖民东方人，根源就在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优越于东方的野蛮民族或未开化民族。

麦金德的论述中无意会流露出当时西方最流行的历史观念。比如他会普遍使用“蛮族”来描述东方民族，在“《枢纽》”的结尾甚至使用当时欧洲流行的种族主义的“黄祸”这个概念来描述亚洲力量的崛起。然而，一旦他从政治地理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对西方人惯常所接受的人文主义历史观无疑是一场巨大革命。因为从地理角度看，欧亚大陆是被海洋包围的一块完整的陆地。麦金德正是从陆地与海洋对峙的全球地理空间尺度出发，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就意味着亚洲历史并不是处在欧洲历史的“外面”，或者作为欧洲历史的“背景”而存在的，它而本身就欧洲历史内在的有机部分。正是从一个地理学家俯瞰全球陆地与海洋的宏观空间视角出发，麦金德建构了全新的欧洲历史。尽管他是从欧洲人视角出发来建构全球的历史，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比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学家，麦金德应该说是最早确立了从全球空间地理视角看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他是“向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的全球概念的第一个人”。^①后来无论是汤因比的“大历史”，还是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无论沃勒斯坦到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还是麦克米兰以来的“全球史”，他们都从全球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属于麦金德

^① 这是麦金德 1904 年演讲发表后，当时参与讨论的约翰·怀南特对其评价。参见吉尔伯特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撰写的引言。麦金德，同前注 1，第 18-19 页。

迟到的门徒。

正是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麦金德看到的欧洲历史并非人们所熟悉的从希腊罗马、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这样发生在“欧洲”这块地理空间中的一连串事件连续构成的历史。相反，他以全球海洋与欧亚大陆的互动的宏大空间视角来重新审视欧洲的历史。为此，他从两个方面矫正了欧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学）所建构起来的欧洲史。

其一，亚洲历史并非附属于欧洲历史，相反是欧洲历史附属于亚洲历史。如果说修昔底德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普遍将亚洲的历史隶属于欧洲的历史，尤其是启蒙思想家更按照普遍历史将非西方的历史整合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而让非西方历史附属于西方历史进程，那么麦金德在历史叙述中将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多来。为此，他大声疾呼：

“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话，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①

而这种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就来自麦金德从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学视角来重述欧洲人熟知的历史。

为了批判欧洲人文主义史学对亚洲的想象，麦金德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揭示出这种历史想象的地理根源。从地理的角度看，整个欧亚大

^① 同上，第 52 页。

陆边缘地带上，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中国在地理环境适合于人类居住，从而创造出人类文明，他将这些地理空间中居住的人称之为“居住人”（settling man），而在地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阿拉伯沙漠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是这块地区将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方文明隔离开来，而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却作为地理通道连接着东西两个文明，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总是居住着适合于旅行的民族，麦金德称之为“旅行人”（traveling man）。“他们在东西方之间拉上了帷幕，从而强化了沙漠的效果。……丝绸从中国人手中转到沙漠人手中，又从后者转到罗马人之手。但是，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了解加起来也就是 Serica 这个名字，即丝绸之地，然而中国人却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西方人无法接触到东方人，西方人对东方的知识只能是道听途说，西方人是通过黑色的眼镜看东方的。”^①正是从空间地理的角度出发，麦金德特别指出土耳其人推翻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绿洲文明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即它阻断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但却推动了西方在大西洋的海上通往东方的探险活动，最终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因此，历史上的伟大时代恰恰也是地理上的伟大时代。“难道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至少与地理上的最大特征联系在一起？世界文明因为罗马文明和印度中国文明而呈现出孪生特征，正是基于两块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被空旷的沙漠所分割。”

^① H. J. Mackinder,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6, No. 2, 1890, p. 82-3.

①

麦金德不仅揭示了西方历史对东方文明进行想象的地理起源，而且揭示出西方历史中以“亚洲”作为外在的“他者”来建构“欧洲”文明的地理起源，即在欧洲人始终处在亚洲东方的入侵导致的生存危机中。“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②因此，西方人要真正理解自己面临的历史命运，就要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重新建构欧洲的历史和人类历史，将欧洲人的历史放在全人类的历史中重新加以理解，这就意味着首先就在空间地理上将欧洲大陆看作是一个整体。

其二，近代之前的欧洲之所以长期被亚洲国家所打败，与政体自由与否无关，与民族的文明或野蛮无关，而是由欧亚大陆形成“中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理空间所决定的。如果从欧亚大陆整体来看亚洲和欧洲的关系问题，就会发现近代之前欧洲始终处在面对亚洲力量入侵的境地。古希腊始终要面对东方波斯帝国的入侵，甚至最终被东方马其顿帝国所灭。罗马帝国之后破碎的欧洲不断受到亚洲民族的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侵蚀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侵占了西方文明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将欧洲文明压缩在狭小的拉丁半岛。至于蒙古帝国席卷欧洲，造成欧洲人长期对东方的恐惧心理，甚至编造了“黄祸”这个概念。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历史观将其诉诸亚洲的专制政体或者亚洲的野蛮，而麦金德实际上否定了这

^① 同上, p.83.

^② 麦金德, 同前注 1, 第 52 页。

两种理论解释。他从地理的角度考察了欧亚大陆最基本的地缘特征，及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构成中心心脏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二元格局，而位于中心的地带的民族利用广阔平原的地理优势轻而易举地对边缘地区的欧洲构成压力。

如果说传统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仅仅看到了体制、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与历史发展之间关联，那么在麦金德看来，这显然是一种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唯心主义解释。麦金德更希望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给出了更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解，^①强调地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气候、土壤等自然要素与人类历史的内在关联。正是从陆地与海洋的全球地理格局入手，麦金德通过“空间革命”重新阐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欧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

政治地理学讨论的是地理与人类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内在关联。地理是以空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政治是以一种支配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地理空间是如何影响到这些不同地理空间中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的支配关系。由此，我希望用“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这两个概念来澄清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的内在学理逻辑，即讨论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不同民族和文化所形成在在空间地理上的政治支配关系。需要

^① 麦金德特别指出，“我承认，我只能达到真理的一个方面；也无意踏上极端唯物主义的歧途。起主要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同上，第 50-51 页。他所说的“极端唯物主义”显然是指地理学中的地理决定论的观点。

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地理空间关系不仅指由地理自身的要素，比如陆地海洋、山川河流的地貌特征以及气候、土壤和资源条件所形成的空间关系，这些地理空间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指相对于人类的活动，尤其是技术发展和进步而言，不断改变中的地理空间关系，比如海航技术就会改变原来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地理关系。如果说“自然地理学”强调的前一种相对静止的地理空间关系，那么“政治地理学”始终从人类活动角度强调一种出于变动中的地理空间关系。正是这种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导致政治支配空间关系的变化。

麦金德始终将全球“地理空间”划分为大陆与海洋的二元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政治地理学中的“政治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政治地理学家，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到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在“政治空间”中权力支配关系之间的变化。正是从大陆与海洋的地理空间关系对政治空间关系的影响出发，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

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早期对地理空间的想象都是以人类居住的大陆为中心，大陆周围被神秘的海洋所环绕包围，哪怕对于欧洲航海民族，海洋也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属于神话故事的题材，海洋总的来说是作为大陆的背景，也就是人类基本生活空间的背景出现的。可以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陆地为中心的阶段，而且世界历史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可以说这是欧亚大陆不

同民族共同创造的时代。

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看，欧亚大陆是一个整体，非洲也与这块大陆相连，但将欧洲和非洲分开的不是地中海，而是撒哈拉沙漠。这片广袤的沙漠将非洲分割为两部分，南部非洲的黑人则构成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而北非在地理上就被组织整合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体系中。这是一块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大陆，它的北部被冰块环绕，属于高寒森林地带，基本上不适合农业发展和居住。中部是从东欧到西伯利亚的一片开阔的草原地带，适合于放牧。往南就是高原地区沙漠然后进入濒临海洋的平原地区。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将欧亚大陆的分割为中间开阔草原地带和濒海的平原地区，麦金德将前者称之为“心脏地区”，将后者称之为“新月形的边缘地区”^①这种独特的二元地理空间从根本上奠定了欧亚大陆二元政治空间格局最基本的政治支配关系。

其一，“边缘地区”拥有相对于“心脏地带”的文明优势。由于边缘地带所处的纬度集中在热带和温带，而且又临近河流和海洋，非常适合于农业生产，加之海洋和河流的机动性有利于商业贸易，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麦金德将新月形的边缘地带分为四个区域：东亚地区、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西欧地区，对应着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也对应着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四种文化体系。比较而言，“心脏地带”的开阔草原无法养活大量定居人口，只能适合于游牧，因此文明程度也相对

^① 同上，第 62 页。

比较低，以至于在这些边缘地带的目光中，心脏地带居住的民族始终被看作是落后的野蛮民族。这就意味着边缘地带的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对于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很容易遭受到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入侵。

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大陆的历史既是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入侵边缘地带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被边缘地区的文明所逐渐同化的过程。在西方就是地处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入侵欧洲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欧洲文明，尤其是它们逐渐认同希腊文明或希腊-东正教文明并依此来对抗西欧的罗马-拉丁文明。而在东方就是中华帝国面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在文化上对其不断同化而逐渐扩大地理版图。在这个阶段上，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也是暴力与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征服与同化的复杂互动关系。

其二，“心脏地带”始终拥有对“边缘地带”的军事战略优势。心脏地带开阔的草原只能维持“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①“一般来说十分适合骑马合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②因此，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利用骑兵和骆驼的机动性对边缘地带构成巨大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印度、波斯历史上不断受到北方民族的侵袭，欧洲历史上不断受到东方民族的侵袭。这些故事在不同的文明中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比如在中国就和长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就和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① 同上，第 60 页。

^② 同上，第 62 页。

然而把这些边缘地带不同文明的历史放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中，就会清晰地看到这些不同的故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上的起源。所有这些侵袭都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开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一切都是由欧亚大陆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如果说在麦金德之前，人们只能在思想文化中寻找其根源，比如长城往往把看作是中国人闭关锁国的封闭象征，而十字军往往让人们想起西方的宗教狂热，然而恰恰是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恰恰让人们第一次看到地理环境这种沉默的支配性力量对欧洲大陆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巨大影响。

为了说明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所构成的基本政治格局，麦金德特别注意到大陆边缘地带第三个地区的阿拉伯半岛。一方面，这个地区具有海洋和河流。且形成绿洲农业，在本质上属于“边缘系列的帝国”，但另一方面这里受到撒哈拉沙漠影响形成沙漠地带，非常有利于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从而具备了大陆心脏地带的特征。这种同时具备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二元地理特征导致这个地带成为大陆边缘“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这里可以进入印度、进入埃及、越过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匈牙利。正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导致欧洲要面对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从大陆心脏地带进入欧洲的突厥人、蒙古人，另一方面是从大陆边缘地区阿拉伯半岛进入欧洲的萨拉森人、土耳其人。“维也纳抵挡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拒着从两个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

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①

正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理空间结构中，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西方世界持续不断地遭受来自欧亚大陆上亚洲东方世界的打击，其中不仅有来自“心脏地带”的匈奴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帝国的轮番打击，而且受到来自北方海上的维京人和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海盗的打击，这些力量将欧洲人压缩在一个狭窄的地理空间中。可以说，现代欧洲的各种民族实际上都是在应对亚洲入侵，维京人和海盗的侵扰中形成的。现代欧洲就是在“巨大的亚洲铁锤”捶打形成的，^②“那捶打所有的锤就是来自‘心脏地带’的陆上力量。”^③正是在这种的欧亚大陆的空间地理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麦金德强调欧洲历史从属于亚洲，因为亚洲力量塑造了现代的欧洲格局。日耳曼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西迁移进入英国，形成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不断赞美日耳曼民族，并将其看作是欧洲人“自由的工厂”，^④实际上就是在赞美英国自由政体的历史起源，即欧洲人不屈不挠地抗击东方亚洲人入侵中所形成的民族性格。

正因为如此，麦金德对人类历史的划分直接从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开始，而完全没有提到罗马帝国时代欧洲的扩张。因为在他看来，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地区性帝国”，^⑤罗马帝国的扩张缺乏全球史上的

^① 这一段落中的相关引文，见麦金德，同前注 1，第 63 页。

^② 同上，第 56 页。

^③ 麦金德，同前注 13，第 88 页。

^④ 孟德斯鸠，前注 14，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八章第五节。

^⑤ “从广处来看，罗马帝国其实是一个地区性帝国；它全然地属于大西洋海岸地带。” 麦金德，同前注 13，第 82 页。

意义。^①而麦金德越过罗马帝国直接从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开始，恰恰是为了凸显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是在欧亚大陆上亚洲人和欧洲人展开全球互动的格局中开启的，而英国逐渐脱离欧洲大陆走向独立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如果我们从全球史的角度看，麦金德肯定会认为全球历史的第一个时代乃是亚洲人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空间的基本格局，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

三、“空间革命”与海洋世界的兴起：世界历史的欧洲时代

正是面对亚洲东方民族构成的生存压力，欧洲人不得不向海洋进发，以找到能够与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进行商业贸易的航道。而在哥伦布之前，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已经形成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欧洲只是以阿拉伯商人为中介而间接地参与其中，“郑和下西洋”就是这个时期的全球航海贸易的象征。^②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哥伦布所代表的西方航海继承郑和所代表的东方航海的成果，通过海洋打通了全球大陆与海洋的联系，从此海洋被人类所认识，海洋上升到与大陆对等、甚至更为优越的位置上。而在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使得大陆与海洋的对峙成为一种普遍的地理空间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出现在地理学家的著作中，而且出现在军事战略家以及史学家的著作中。比如法国地理学家比阿什（Philippe Buache）在地理学中率先将陆地与海洋作为一种新的自然

^① 关于麦金德对罗马帝国地缘战略的反思，参见强世功：“地缘政治战略与世界帝国的权势转移：从‘壮年麦金德’到‘老年麦金德’”，张广生主编：《中国政治学》，第二辑（即出）

^②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区分。^①法国军事学家兼海军上将卡斯特克斯（Castex）专门写作《海洋对抗大陆》，将历史理解为海权对抗陆权的历史，而且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也在《海权论》中阐述类似的观点。这种大陆与海洋的对峙尤其因为英国作为海洋国家与俄国作为大陆国家在 19 世纪展开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可以说，“大约在 19 世纪末期，人们喜欢将当时的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成这么一个流行的图景，即北极熊与鲸的争斗。鲸就是利维坦，一种巨大且神秘的鱼，……而北极熊则是陆地动物的象征之一。”^②

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提出以大陆与海洋二分的全球地理空间观念来看待人类历史。不同于卡斯特克斯、马汉之类从海军军事战略角度思考陆权与海权，也不同其他作家从哲学隐喻的角度来理解陆地与海洋的斗争，麦金德将陆地与海洋作为政治地理学理解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的一把钥匙。他将哥伦布发现海洋世界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空间革命”，并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哥伦布航海意味着全球历史进入了第二个时代，即“哥伦布时代”。

不少思想家都注意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空间革命，但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空间革命这个概念，比如马克思就从地理大发现中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性以及由此带来了全球无产阶级的统一性，^③而施米特从中看到了欧洲思想观念的总体性变革以及由此带

^① 参见迪金森：《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商务引书馆，1984年，第20页。

^② 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③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来的法权秩序的变革。^①然而，在麦金德的论述中，这种地理空间的革命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是一个强调技术决定性作用的唯物主义者。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关注工业技术进步推动的工业革命，而麦金德强调的是航海技术及其背后天文学、地理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地理空间革命。地理大发现将世界的海洋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人类第一次可以俯瞰地球，对地球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然而，如何认识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依然取决于人类看待地理空间的视角。若从海洋角度看地球，那么地球就可以理解为“海球”而非“地球”，大陆不过是漂浮在海洋上的巨大岛屿。麦金德 1919 年提出“世界岛”这个概念就是从海洋的角度看欧亚大陆。然而，他在 1904 年的演讲中是从欧亚大陆的角度看世界。^②由此，他认为哥伦布航海推动的“空间革命”就在于欧洲人看待地理的空间视角从前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转向了海洋、转向了新大陆，由此欧洲人眼中的地理空间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即前哥伦布时代基于欧亚大陆的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元地理空间也就变成了哥伦布时代的三元地理空间：欧亚大陆“心脏/枢纽地带”、围绕欧亚大陆的“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和由新发现的美洲、大洋洲、南部非洲及其周边广大的海域所构成的“外部（或岛状）新月形地区”。^③

^① 参见施米特，前注 34，第 31 页。

^② 关于麦金德看待空间地理视角的变化，尤其是从大陆视角向海洋视角的变化及其背后世界帝国权势从大英帝国向美利坚帝国的背景，参加强世功，同前注 31。

^③ 麦金德，同前注 1，第 68-69 页。

地理空间的革命必然带来政治空间的革命，从此世界政治呈现出中心地区、内边缘地区与外边缘地区之间更加复杂的政治博弈。比如1840年以来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就是心脏地带的俄国、内部边缘地带的英法、中国和日本以及外部边缘地带的美国之间的复杂博弈。然而，这些复杂的博弈被麦金德以简单化方式压缩为欧洲与亚洲的博弈。哥伦布时代全球地理空间从二元格局转向三元格局的历史重大意义就彻底逆转或颠倒欧洲人与亚洲人在政治空间上的支配关系。

其一，欧洲借助海洋带来的军事和商业贸易的力量将传统的“内新月形地区”与新发现的“外新月形地区”整合在一起，以至于支配了欧洲大陆心脏/枢纽地带之外的包括海洋和新大陆的整个世界。原来被东方亚洲游牧民族围困到西欧狭窄的欧洲人朝向海洋变成了“航海民族”。“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指新大陆——引者）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地区变成属地”。^①周所周知，地理大发现以来，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些海洋帝国率先崛起并开始抢先瓜分世界，并在他们的主导下建构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表面上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一个欧洲列强内部协调相互关系的条约体系，然而欧洲条约体系是以全球陆地与海洋的秩序建构作为想象的。具体而言，欧洲列强作为领土国家所占据的欧洲原初领土属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对它适用主权独占的原则；而海洋对所有国家开放，对它适用海洋自由原则；新发现的土地（比如美洲、大洋洲和南部非洲）属于可以自由占领的土

^① 同上，第65页。

地，它适用“发现原则”，即某个列强国家宣布发现之后就拥有对其他列强的排他性法权来建立殖民地；拥有古老文明的亚洲、非洲各国的领土在欧洲国际法上的地位则处在国家领土和新发现土地之间，欧洲列强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取得特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和各种豁免权等）。^①

其二，欧洲因为整合了心脏枢纽地带之外的两个新月形地区，从地理上抵消了“中心/枢纽地带”曾经所拥有的战略优势地位，导致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逆转，即欧洲赢得对亚洲的政治优势。“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的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或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大陆强国。在水域中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

^① 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三章。

连串外围岛屿甚至基地，它们是欧洲大陆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

①

如果说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是由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游牧民族利用草原和沙漠中的骑兵和驼队的机动性而赢得战略优势，那么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人掌握了“海权”而充分利用海洋的机动性来抵消草原和沙漠的机动性，从而逆转了第一个阶段上欧洲人的颓势，取得了对东方亚洲人的战略优势。欧洲人正是借助广阔的海洋将新发现的外部新月形地带和传统的内部新月形地带整合起来，利用其强大的海军所掌握的制海权和贸易的便利而赢得对心脏地带的优势地位。麦金德用“颠倒”一词来对比哥伦布时代与基督教时代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政治关系，足以说明海洋世界以及新大陆对欧洲人支配全球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大英帝国作为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海洋帝国也因此取得了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的优势，成为唯一的世界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哥伦布时代在麦金德心目中与其说是世界历史的“欧洲时代”，不如说是世界历史的大英帝国时代。

四、新“空间革命”与全球争霸：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从自然地理学角度看，如果说在前哥伦布时代，欧亚大陆被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符合自然地理学的划分，那么在哥伦布时代，将世界分为心脏/枢纽地带、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分法

① 麦金德，同前注1，第64-65页。

并不完全符合自然地理的基本条件，而且在进入 19 世纪这种划分更显示出其弊端。一方面南部非洲、大洋洲到整个美洲的大陆领土总和远远超过欧亚大陆。另一方面无论是非洲、大洋洲还是美洲都已完全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荒蛮之地，而是经过几百年欧洲殖民之后已经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尤其是北美洲的美国已经历了南北内战之后的工业化浪潮，作为世界强国开始进入全球历史空间中，甚至早在 1823 年美国就推出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将整个美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以排除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对美洲政治事务的干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麦金德 1904 年发表“《枢纽》”这篇演讲之前十多年，美国的地缘战略就马汉在 1889 年就从海洋世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海权”（sea power）理论，并由此作为美国的地缘战略。^①

麦金德在 1904 年的“《枢纽》”中虽然也提到了马汉的观点，但在在他看来马汉的理论不过是他提出来的“哥伦布时代”的一个脚注，证明欧洲凭借海洋的机动性在战略上获得相对于亚洲大陆的优势。如果说马汉致力于推动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帝国迈向海洋而成为世界海洋帝国，那么麦金德则始终从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立场来理解世界政治地理格局。而英国与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不同就在于美国要面对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广阔的大洋，只要走向海洋就能成为世界性帝国，而大英帝国作一个世界海洋帝国却始终面临着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在麦金德眼中，这些彼此相互独立的大陆却

^①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 年。

被看作是“岛屿”，而且这些大陆作为“岛屿”都是围绕欧亚大陆展开的，以至于提出“外部/岛状边缘地带”这样的空间概念。

可以说，麦金德始终以 19 世纪大英帝国的命运作为理论思考的出发点。无论地理大发现怎样改变自然地理空间，但从大英帝国独特的空间地理环境看，它作为欧洲大陆边缘地带的海岛国家，始终处在大陆与海洋之间的中间地带。如果说马汉试图将大陆与海洋对立起来，那么麦金德虽然强调大陆与海洋的对立，但却始终将大陆中心的心脏枢纽地带与边缘地带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空间对立起来，从而形成大陆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元分析框架。这种理论视角显然来自英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无论是二元格局，还是三元格局，麦金德始终从欧洲的视角，准确地说是大英帝国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始终以把欧亚大陆的心脏/枢纽地带作为全球地理空间的重心所在，并围绕着欧亚大陆来理解全球历史。由此，人类历史被看作是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搏斗的历史，从而形成的第一阶段上大陆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亚洲时代和第二阶段上海洋国家获得优势的哥伦布时代或欧洲时代。

正是从大英帝国的全球视角出发，麦金德敏锐地意识到 19 世纪晚期全球地理空间发生了一场新的“空间革命”。一方面即伴随着哥伦布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已进入尾声，整个世界已经完整地被西方人探险发现或占领征服，再没有新的地理空间需要被探险或占领，从此人类生活在一个“以整个世界作为衡量尺度”（world-wide scope）的“封

闭政治系统”（a closed political system）中，^①由此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具有全球意义。“每一个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②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入无线通讯、飞机、飞艇和潜艇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正如航海技术推动了第一次“空间革命”，那么 19 世纪的铁路、通讯、飞机技术的出现推动“一个相似的**革命**正在发生在现今这一代人，由于陆上和空中的现代交通方式，人们正迅速地意识到，这大陆也是一个整体。”^③铁路和飞机这样的现代交通方式取代了古代的战马和骆驼，从而大幅度提升了陆地交通的机动性，使得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地理空间革命必然引发世界政治空间革命，以至于人类历史从“哥伦布时代”进入“后哥伦布时代”（the post Columbian age）。

其一，欧洲人在哥伦布时代享受的殖民和征服的自由已接近尾声，“欧洲自由时代”走向终结，欧洲列强会“把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移到争夺相对优势的斗争上来”，而它们在全球“封闭政治系统”中的争夺必然引发世界大战。哥伦布航海推动的第一次空间革命带来了海洋航行和贸易自由，但也因此带来了领土的占领和殖民的自由。正如施米特敏锐地指出的，近代欧洲之所以将自由作为核心价值并依此来建构欧洲国际公法秩序，首先就在于有一个可以自由占取土地的

^① 麦金德，同前注 1，第 50 页。

^② 同上，第 50 页。

^③ 麦金德，同前注 13，第 66 页。

“宏大的自由空间”。^①近代欧洲的列强争霸之所以能够维持主权平等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就在于列强可以将侵占的力量投放在海外“自由土地”上，恰恰是依赖欧洲之外取之不尽的殖民地来调节欧洲内部的列强关系，尤其是欧洲列强依据“发现原则”来协调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②19世纪欧洲内陆德国和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这些的大陆帝国、新大陆的美利坚帝国和东方的新贵日本也纷纷崛起并赶上了到瓜分世界末班车。1885年瓜分非洲的“刚果会议”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就像是“哥伦布时代”的最后盛宴，象征着“欧洲自由时代”的终结，德国、俄国、美国乃至日本这些新兴列强与英国和法国这样的传统欧洲列强一道分享对世界的瓜分和占领。从此之后，再没有新的自由领土能够满足欧洲新兴列强的自由欲望。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对全球的探险和发现已经结束了，也意味着随着欧洲“对界外土地进行政治扩张的灵活性，也已不复存在。”^③列强之间因为瓜分不均开始产生了利益矛盾和争夺，尤其是传统列强与新兴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大，其中最大的矛盾冲突就是俄国从欧洲大陆向东、向南、向西的扩张导致英国一贯主张的大陆平衡出现了失衡，从而与英国作为全球帝国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从而引发19世纪英国与俄国之间漫长的“大博弈”。当欧洲列强的内部矛盾无法通过对自由土地的占领和殖民释放出去，欧洲列强的内部矛盾必然要在全球“封闭体系”中爆发，这就意味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将要演变为世界大战。

^① 施米特，同前注。

^② 关于欧洲列强在美洲占领土地采取的“发现原则”的相关讨论，参见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三联书店，第七章。

^③ 麦金德，同前注13，第30页。

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全球争夺也反映到 19 世纪的西方思想理论中。从哥伦布时代以来，在为所欲为地自由征服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殖民主义的基础上，西方思想建构起了西方民族或文明优越于非西方民族或文明的等级制，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形而上学的启蒙哲学，无论政体理论，还是普遍历史观，无论是“天定命运”，还是“白人负担”，都在系统地维护西方文明支配非西方文明的永恒秩序。然而，19 世纪在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摧毁了西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所维护的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永恒之需。“来自达尔文主义的持续变迁和进化的思想代替了所谓仁慈上帝给他的造物注入安定与永恒的基督教概念，具体的斗争取代了被公认的法则，也许最重要的是人类在本质上已成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上帝创造的所为了。”^①在此基础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普遍兴起，斗争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决定着自然和人类的发展演化方向。由此，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实际上都在摧毁哥伦布时代西方人建立起来的秩序，为建立新的秩序而努力。因此，19 世纪晚期的诸如尼采、斯宾格勒这样的思想家都已经捕捉到“西方没落”、“历史终结”的时代氛围。

“这种失望和恐惧的气氛，直接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失控所致，事后看来，内在的根源在于第一次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终结’。近五个世纪以前开始的长期的地理大发现和地理扩张的停滞诱发了这一结果。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正如布赖

^① 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8 页。

斯伯爵所言，‘它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到 19 世纪末，世界的完整性最终被揭示出来，但它所表明的含义似乎产生了更多的失望。19 世纪末世界强国所面临的现实就如巴比伦的亚历山大临终时以一样，已没有多余的世界可供征服了。布赖斯在 1902 年的罗马宣言中指出，‘对地球的探索已完结’，‘文明世界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了他们以前一无所知的家园’。……对于几个世纪里习惯于想象在无限的范围之外还有无穷的新陆地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境况，它加剧了对全球有限不动产的争夺，无疑包括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正是世界的探索趋于完结才称为 19 世纪末帝国繁荣的心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基石。”^①

可以说，正是地理探险的终结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兴起，这门学科的兴起实际上是服务于欧洲列强从占领领土转向争夺领土的历史大趋势。因此，比如拉采尔认为，国家就像一个“空间有机体”，就像树木生长在土地上一样把根基牢牢扎在土壤里。因此，国家的发展需要适合于其领土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而国家要变得不断发展和强大也就需要更大的地理“生存空间”，就需要向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领土进行扩张，这恰恰是显赫的国家与碌碌无为的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而拉采尔的学生契伦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地缘政治学/地缘战略”（geopolitik）这个概念。^②

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在拉采尔、契伦等人那里作为一种服

^① 帕克，同前注 4，第 18-19 页。

^②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以及拉采尔、契伦等人思想的简单概括，参见帕克，同前注 49，第 11-13 页。

务于国家战略的学问，然而，在麦金德这里则成为一种思考全球空间与世界历史内在关联的学问，这种区别或许是由于拉采尔所在的德国和契伦所在的瑞典不过是区域性国家的陆地国家，而麦金德所在的大英帝国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而恰恰是这种思考问题尺度的差异，使得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更具有一种其他地缘政治学家所缺乏的宏观历史视野，即通过大英帝国在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特殊处境来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具体而言，19世纪晚期的新的“空间革命”所开辟的后哥伦布时代对于世界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恰恰是对这个问题追问和回答使得麦金德超越了包括马汉在内的所有地缘政治学家而进入到伟大思想家之列。

其二，科学技术使得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并获得与海洋世界相匹配的战略优势，以至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不是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也不是当时面临的民族战争或阶级战争，而是地缘战争，是大陆心脏/枢纽地带与海洋世界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战争。而在这场争夺中，大陆国家拥有相对于海洋的战略优势。一部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也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从前近代欧洲的宗教战争慢慢发展到近代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引发的战争慢慢发展到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斗争引发的战争。以至于在通常的政治和历史理论中，19世纪晚期欧洲危机中引发战争的力量主要来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然而，在这战争性质不断变化的历史演化中，麦金德看到永恒不变的地缘政治本质。

在麦金德看来，人类历史乃是陆权与海权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

历史从经历了雅典、罗马帝国的局部性斗争逐步迈向基督教时代的全球历史。这些战争无论以宗教战争、民族战争还是阶级战争的面目出现，其实质永远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战争。如果说基督教时代欧亚大陆心脏枢纽地带的骑兵、驼队利用草原的机动性取得对处于边缘地带的优势，从而使得世界历史成为“亚洲时代”，那么哥伦布时代欧洲海洋民族利用海洋航海和贸易的机动性取得了相对于大陆心脏地带的优势，从而使得世界历史进入到欧洲时代，那么随着第二次空间革命的展开，世界历史进入到大陆心脏枢纽地区与海洋世界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新时代。

如果说是在哥伦布时代，由于全球的开放性，海洋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利用控制海洋而方便地占领新的殖民地，从而随意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而在后哥伦布时代，在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中，再没有新的陆地可供占领，这就意味着海洋国家的战略优势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相反，铁路乃至飞机的出现使得欧洲大陆的“心脏/枢纽地带”不仅拥有了与海洋世界相匹配的机动性，从而与海洋世界势均力敌，甚至大陆国家在陆地扩张中已经进入到海洋世界，德国和俄国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出海口，它们不仅拥有广袤大陆的资源优势，而且获得了海洋国家曾经拥有的优势。由此可见，在这个全球争霸的时代，海洋国家非但不能像哥伦布时代那样拥有绝对地理战略优势，而且在与大陆国家的竞争中处在劣势上。究竟大陆帝国还是海洋帝国最终取得全球统治权，尤其要依赖在陆地帝国与海洋帝国在斗争采取怎样的地缘战略布局来取得地缘政治的优势。这恰恰是地缘政治学兴起并发展为地缘政

治战略的意义所在。

麦金德对即将到来的历史时代的划分无疑建立在对 19 世纪世界政治的观察之上。当大英帝国利用制海权优势向西航行完成了对内、外边缘地带的整合从而取得对心脏地带的优势之际，俄国的势力也开始贯穿整个西伯利亚。“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部署它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从而管辖了草原区”，^①并最终借助铁路完成了对整个心脏枢纽地带的整合并将势力推到太平洋西岸，不仅完整地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开始获得出海口进入海洋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西方世界拥有海洋资源而全球处于优势地位，但东方世界的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开始崛起，并与西方世界展开竞争。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揭示出英国与俄国在整个 19 世纪“大博弈”中的战略本质：“俄国占据着几乎整个‘心脏地带’，在印度的陆上门户叩关。而另一方面，英国敲击着中国的海上门户，并从印度的海上门户深入内陆，面对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②

这就意味着全球争霸乃是俄国和德国这些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陆帝国与大英帝国这样基于边缘地带和岛屿地带的海洋帝国，分别借助铁路技术和航海技术完成的大陆与海洋的整合之后，人类历史终于迎来了陆地与海洋争夺全球领导权、建立“世界帝国”(a World Empire) 的对决时代。欧洲历史上“帝国之间的对抗”从欧洲内部的局部对抗逐步发展为欧洲与亚洲的对抗乃至最终发展为全球对抗。^③正是在这

^① 麦金德，同前注 1，第 65 页。

^② 麦金德，同前注 13，第 115 页。

^③ 同上，第五章。

种势均力敌的格局中，我们才能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理解麦金德在“《枢纽》”结尾的政治预言：一旦大陆心脏枢纽地和东方边缘地带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那么就同时获得大陆和海洋的地理优势，这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无疑是终结其作为全球帝国的噩梦。事实上，麦金德在“《枢纽》”、“《重建》”和“《环形》”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地缘战略思想，只有放在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在势均力敌地理条件基础上展开全球争霸的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看出其智识光芒与政治洞见。

五、“麦金德时代”的历史遗产：全球地缘格局下的中国

毫无疑问，麦金德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仅从欧洲的政治视角出发将整个世界理解为欧洲与亚洲的关系，而且从大英帝国的视角来划分全球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从而建构起了中心/枢纽与边缘地带、陆地与海洋、“世界岛”与“岛状新月地带”之间的对峙。正是透过政治地理学的分析，麦金德让欧洲人（英国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欧洲人的历史天命，那就是从基督教时代到哥伦布时代，无论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如何变化，都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永恒不变的主线，即处在大陆边缘地带的欧洲命中注定要与大陆心脏枢纽地带展开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斗争。只不过在第一阶段上基督教时代这种争夺仅仅局限在欧亚大陆，中心/枢纽地带具有战略优势，而在第二阶段哥伦布时代这种争夺扩展到全球，欧洲（英国）统帅的边缘地带反过来获得战略优势。经过这两个时代的

相互较量之后，19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进入后哥伦布时代，欧洲所有民族都要卷入到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世界争夺全球统治权。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历史称之为“麦金德时代”。

1900年之后，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大战。一战原本是欧洲内部争夺领土和资源的古典战争，然而由于美国的卷入被塑造为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战争，此后二战和“冷战”也因为苏联和美国变成意识形态的战争，至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战争依然被意识形态话语或“文明冲突”话语所覆盖。然而，如果我们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看，在这些不断变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背后乃是不变的地缘政治法则，即无论这些战争以打着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旗号，战争始终围绕麦金德所划分的大陆与海洋、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展开，而且战争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全球统治权，只不过争夺全球统治权的主角从德国、俄国与英国逐步演变为苏联（俄国）和美国。德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曾经是敌人，但却同样分享了大陆帝国的地缘政治遗产。同样，美国冷战中或后冷战发起的一系列“热战”，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尔干战争以及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叙利亚的伊斯兰系列战争，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意识形态、面对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展开，但发生在麦金德所标示出的围绕大陆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带展开，且战争都指向一个目标，如何通过控制这些边缘地带来有效包围并战胜大陆心脏地带，从而其确立并维护麦金德所说的“单一世界帝国”（a single World Empire）的霸权统治。因此，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20世纪无疑属于“麦金

德时代”，即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展现为怎样的“诸神之争”，比如在列宁眼中是针对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眼中是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在以赛亚·柏林眼中是自由主义对抗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在地缘政治上始终是大陆心脏/枢纽地带与边缘地带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斗争。

中国历史只有放在陆地与海洋在全球展开竞争的大格局才能理解。中国地处大陆心脏地带的东南地区，是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结合体。一部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地处心脏地带的少数民族与地处边缘地带的汉族互动的历史，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横跨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独特格局。如果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处于地缘战略优势地位，那么中原和东南汉族主体农耕民族始终处于文明上的优势地位。近代以来，海洋世界崛起，东南商业贸易日益发展起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鸦片战争以来，东南沿海更是率先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由此形成了经济政治上的“北伐”局面，即广东、江浙具有资本主义要素的经济政治力量向北方代表农耕生活方式的经济社会力量展开政治上的争夺。然而，随着苏俄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国共内战的展开，毛泽东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地缘战略向中部和西部转移，从而在苏联支持下取得了地缘战略上的大陆优势，而国民党在英美的支持下拥有边缘地带和海洋优势。由此，中国两党夺取未来中国前途的战争，既是不同阶级力量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展开的斗争，也具有大陆心脏-边缘地带与边缘-海洋地带争夺统治权的要素，而这种争夺又和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帝国与海洋地带的英美西方帝国争夺

全球统治权的交织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交织的复杂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之间的政治取向不仅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治外交格局，而且深刻影响着苏联大陆帝国（华约）与英美海洋帝国（北约）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战略格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与苏联结盟，一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来自大陆心脏地带西北大后方稳固的地缘政治安全，这自然遭到了英美海洋力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构建“岛链”对中国展开经济和政治的地缘战略封锁。尽管如此，中国依然通过继续香港殖民地的战略选择而保留通往海洋世界的通道。在这样的格局中，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19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实际上都是大陆阵营与海洋阵营在边缘地带展开的政治较量，这场较量划定了英美海洋世界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势力范围，正是这两场战役在真正确立了新中国面向东南海洋的领土主权边疆。同样在1960年代的中印战争和中苏边界一系列冲突战争，实际上划定了中国面向大陆西北的领土主权边疆。这一系列地缘战争确立了新中国作为横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主权国家领土边疆。而至今无论是南海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以及新疆的“反恐”问题，依然属于中国在同时面向大陆心脏地带和海洋世界这个广阔过渡空间中的政治主权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从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开始，中国实际上试图在大陆与海洋世界之间开辟独立的地缘政治空间。特别是毛泽东提

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划分，而是从批判“世界帝国”的角度，提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世界帝国”压迫的民族，构成一个反抗世界帝国的“第三世界”。而这种反抗“世界帝国”压迫的全球政治构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地缘战略，即中国作为横跨大陆与海洋的国家，恰恰要地缘政治上打破大陆与海洋的二元划分，构建亚非拉的“第三世界”。中国积极推进建构“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国际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而这恰恰奠定了今天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战略基础。

随着中国“文化革命”的挫折和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意味着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无疑在全球地缘战略中削弱了苏联为首的大陆心脏地带的实力，而这反过来无异壮大了英美海洋世界的实力。这实际上奠定了英美在“冷战”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地缘战略基础。后冷战以来，全球进入了美国为首的“单一世界帝国”时代。然而，从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看，无论是美国策动或影响下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乌克兰战争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无论围绕中国形成的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还是美国在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实际上都是美国为首的海洋世界将实力进一步扩展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从而对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构成地缘战略的最后包围。

而在这个口袋越扎越紧的战略包围中，美国要完成对全球最后的

统治必然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变成依附于美国的战略盟友。这在欧洲意味着用北约来控制欧盟的发展；在阿拉伯半岛乃至中亚则用犹太人以及伊斯兰逊尼派来压制什叶派；而在印度半岛则用印度来遏制中国；而在东亚则用朝鲜问题、中日矛盾、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作为筹码拉拢和遏制中国。可以说，这些问题构成后冷战以来全球秩序变化背后的主线，也构成了后冷战以来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的主线。

可以说，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全部的问题都围绕“麦金德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展开：中国要不要像日本那样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协助美国完成全球统治？前些年，美国战略界在对中国抛出一系列概念，无论是“中美国”、“中美共治”、“中国作为利益攸关的责任方”还是“中美太平洋世界”等，无非是希望将中国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最大“附庸国”，类似于欧洲的英国那样，从而利用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地缘优势来完成其对全球的统治。而要实现这一战略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改造以符合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帝国的要求。在政治上，中国要完成民主化改造，如此全球资本力量才能完全对中国政治的操控，经济上必须被纳入美国经济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业，人民币的定价权也由美元来确定。然而，当中国拒绝了这种“致命诱惑”，在“韬光养晦”战略之下，提出“世界多极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委婉主张，以保持自己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试图谋求升级突破，人民币试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货币，这意味着中国的战略选择与美国的“单一世界帝国”

的战略背道而驰。这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重新开始布局其地缘政治战略，从“亚太平衡”、“重返亚太”战略到“美日印澳”联盟的建构，重新从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从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以来，海内外纷纷讨论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不少人因此批评中国政府，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战略高调引发美国的战略调整。如果从战术层面看，中国政府的很多地方的确可圈可点，然而从战略层面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来没有改变，中美贸易战以及由此引发其他领域的冲突是在地缘政治上不可避免必然冲突。事实上，从1940年代美国争论“谁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误判中国”，都表明美国始终秉持将中国改造为“附庸国”的战略，从而作为其包围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支撑，而这一战略定位是由“麦金德时代”的全球地缘格局所决定的，它是高于美国政党政治之上的更高的“世界帝国”战略。

因此，我们看待中美关系，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的幻想以及由此形成的围绕价值观念形成的唯心主义的思想窠臼，绝不要幻想中国实现了民主化改革之后就可以成为美国平等的战略伙伴。我们只要看看美国对欧元的态度，看看美国对欧盟和日本韩国展开的贸易战，就应该明白地缘政治关系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匹夫无罪，怀璧有罪”。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缘战略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除非美国放弃全球统治权或者美国面临全球危机，否则中国绝不要幻想与美国成为真正平等的战略伙伴。因此，当中国试图谋求人民币国际化，试图推动产业政策实现工业技术的提升，从而威胁到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壑

断，美国立刻就调整其对华战术，从温和的拉拢手段转向激烈的遏制手段，甚至从经济手段转向政治和军事手段。在政治上，美国将中国从过去的“威权主义国家”定位调整为“修正主义国家”，开始建构反华同盟，而军事上也开始在南海和台湾寻找机会，不排除引发局部军事战争乃至全面战争的可能。

正是从“麦金德时代”全球大陆心脏地带和海洋世界争夺全球统治权的地缘政治格局看，处于大陆与海洋之间边缘地带的中国，一旦谋求不同于大陆帝国或海洋帝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必然面临来自大陆帝国或海洋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压力。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今天特朗普惩罚中兴公司并发起对华贸易战，与19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合同，撤回在华苏联专家具有类似的地缘政治效果。在1960年来，在中苏结盟的背景下，当中国试图谋求独立发展的道路，立刻遭到苏联的全面压制，甚至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而今天中国试图寻找独立摆脱美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时，中美“夫妻”蜜月期立刻结束，马上遭到美国严厉的全面压制。因此，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作为横跨大陆与海洋的强国，在“麦金德时代”既是挑战大陆世界帝国或海洋世界帝国的力量，也必然成为平衡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地缘格局从来不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二元格局，而是如麦金德设想的那样，是陆地、海洋与二者之间边缘过度地带的三元格局。中国所处的这种独特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成为平衡陆地与海洋的重要力量，也就是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当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对中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压

力，就必然迫使中国与海洋国家结盟，从而使得海洋世界取得对大陆国家的绝对优势，这就是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化。那么，当海洋世界的美国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假如这种压力足以使推动中国与俄国等大陆国家再次结盟，这无疑将成为瓦解美国这个世界帝国的地缘政治力量。

正是在这种地缘格局中，我们看到中国与俄国共同面对“单一世界帝国”的压力而建构起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而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上合组织”峰会、“G7 集团”峰会、“金特会”、“特普会”表明，整个世界不仅围绕大陆与海洋展开全球博弈，而且围绕大陆边缘地区的叙利亚、朝鲜、台湾和南海展开。在这样的地缘格局中，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似乎越来越发展为大陆国家的俱乐部，而美国主导的“G7 集团”越来越成为海洋国家的俱乐部。假如伊朗、印度、土耳其这几个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国家也能逐渐加入到“上合组织”中与中俄主导的大陆心脏地带结成战略盟友，假如随着朝鲜问题的解决和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韩主导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乃至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出现，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几个重要的边缘地区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欧亚大陆世界”，再加上非洲这片“南心脏地带”的战略支援。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图景？

然而，地缘政治争夺说到底还是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构成的文明总体实力的争夺。这是一场漫长的“文明持久战”。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所处的大陆与海洋之间过度地带的地理限制，都表明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像曾经的苏联或现

在美国支撑起世界帝国的格局。因此，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从来不是要谋求世界统治，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发展道路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作为大陆与海洋之间过度地带的地缘性质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基于地缘政治和发展道路的选择，走国际联盟的道路。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在大陆与海洋之间的如何选择自己的地缘盟友。

一方面中国和俄国的漫长的边界线以及西北边疆面临复杂多变的中亚地区，意味着当俄国放弃苏联当年的世界霸权野心之后，中国必须与俄国建立起稳固的友好关系，由此中国才能背靠大陆，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和技术、经济和政治领域现代化发展。而走向世界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然而，问题在于美国作为世界帝国对每一个新兴力量的发展都怀有敌意，始终从意识形态出发试图改造中国，对中国走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强烈怀有敌意，因此中美之间很容易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无法真正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互信甚至形成同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成长过程：当中国弱小以至于成为大陆强国或海洋强国的筹码时，比如利用这种筹码的优势而采取“一边倒”的地缘战略来推动自己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地缘战略选择就是范例。然而，当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开始走出自己的独立的道路时，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承担与大陆或海洋强势国家逐渐拉开距离所带来的压力，这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修课。曾经的中苏关系破裂和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具有相似的效果。前者是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导致中苏之间彻底决裂乃至兵戎相见，后者面对的则是在相对和平的背景下中美之间必然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斗而不破纠缠关系。而今天，世界格局进入了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海洋世界的美国和处于边缘过渡地带的中国之间的复杂博弈，而这样的博弈恰恰是麦金德所未能遇见到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要始终坚持自己作为边缘过渡地带的地缘战略，一方面“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但另一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同盟，尤其应当重建儒家文化圈，着力与东亚和大南亚国家建立起牢固的战略盟友关系，将地缘政治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力量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大陆和海洋之间作为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来维持世界力量的均衡，维护全球持久的和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奠定实力基础。因此，中国崛起绝不能理解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一系列数字上迅速攀升，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涉及到科学技术、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治理方略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全面提升，若没有巨大的文明力量，根本就无法支撑起有影响力的世界帝国。德国崛起和苏联崛起的教训就在于单纯依靠技术、军事和组织的力量只能在世界政治的海洋上掀起风浪，但风浪之后往往变成泡沫，相反文明整体性力量的复兴看起来平静但却能成为推动潮汐变化的洋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调试、扎根和生成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怀着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刚刚尝到经济发展的滋味就经不住追求政治权力和荣

耀的致命诱惑，而应该夯实我们在技术、经济发展的基础，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让社会发展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将我们推向世界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怀着平常心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既不能以一种投降主义的心态服从美国，也不能以一种傲慢自大的心态排斥美国。当前充斥舆论的这两种心态其实都是政治上幼稚的不成熟心态。真正的政治成熟乃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不卑不亢的自信，打开胸怀来虚心学习美国成长为世界帝国的历史经验，学习美国技术创新、文化教育和法治治理，学习美国人做人做事的朴素品格，从而将世界帝国的经验和意识融入到中国文明复兴的血液中。

六、认真对待地缘政治学：大国崛起的必修课

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必然伴随着全球性的思考。这在政治思想上必须展现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又必须在地理上展现对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思考。政治哲学关注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政治学关注政治组织和社会阶层的力量，而唯有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理及其自然要素对政治活动的支配性力量。我们要避免地理决定论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思想，但也绝不可陷入价值决定论、思想决定论的唯心主义陷阱。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要看到地理的支配性力量与思想的能动性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任何一个全球性国家，如果它试图用全球的眼光看世界，除了具有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还必须具有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素养和地缘政

治战略的丰富想象。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地理学是任何一个志在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修课。麦金德当年致力于在英国开展地理学的教育与豪斯好弗（Haushofer）在德国创办《地缘政治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培养国家精英阶层的全球地缘政治意识。因为与普遍哲学的抽象思考不同，地理必然是具体的，而将具体的地理环境要素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思考，需要在不变的地理要素与可变的人力要素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因此，地缘政治学实际上在培养国家政治精英把握自然与历史内在转化的分寸感，把握自然与自由、不变与可变之间相互转化中形成的历史大势。中国古代法家强调“法”、“术”和“势”，其实地缘政治学就是将自然地理之“法”、将地缘政治战略战“术”与全球地缘政治推动的历史大“势”巧妙地结合一起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从陆地与海洋的对峙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及其转化，实际上就是在指出全球地缘格局推动的历史发展大“势”。

因此，“麦金德时代”不仅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中围绕麦金德提出的大陆与海洋争夺全球统治权展开，而且意味着整个地缘政治学说以及地缘战略思想基本上都是围绕麦金德的理论 and 概念展开。^①可以说，在政治地理学中，至今还没有出现可以全面超越麦金德思想的理论家。这或许是因为今天的历史依然处在争夺全球统治权的“麦金德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希望崛起为全球性强国，中国知识界不仅要复兴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更要复兴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地

^① 参见帕克，前注 49。

缘政治学要作为大国崛起的必修课，不仅应当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进入到小学生的课堂中，由此地理不再是沉默的物质力量，而是展现出一种自然内在的灵性。人作为生活在大地上的生物，其习性和命运与其生存的大地息息相关：大地塑造文明，文明赋予天命。

麦金德虽然一身孜孜以求在大英帝国推动政治地理学的普及和教育，希望地缘政治战略能够服务于大英帝国。然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限制了英国海洋精英的视野，他们满足于海军军官和舰长们对全球海洋地理直接的感觉，而不愿意将此上升到政治地理学的一般讨论，以至于英国此后并没后产生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学家。不过，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极大地刺激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尤其是德国的豪斯好弗可以说是麦金德的崇拜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并宣传地缘政治学，并按照麦金德的理论主张为德国提出建立德俄联盟、泛俄罗斯-南亚集团以及日中俄集团等各种地缘战略建议。遗憾的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被冷冻起来。

今天，真正继承麦金德衣钵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学。二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就运用麦金德的理论，提出新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从英美海洋帝国的角度将德国而不是苏联作为政治对手，从而主张英美海权和苏联陆权的联合来对抗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他试图矫正麦金德的观点，主张统治世界的关键地带不是大陆心脏地带，而是边缘地带，甚至主张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可以控制世界的命运。然而，不可否认他的思想灵感源于麦金德，他

与麦金德的区别仅仅由于时代变化和国家视角的变化对现实地缘政治战略调整的变化，而在基本理论范式上完全接受了麦金德所提供的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基本范式。^①此后，乔治·雷纳（George Renner）虽然关注了飞机和空中航线的出现对传统地缘政治学关于陆地与海洋的挑战，但他的理论也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分析，只不过在现实层面的战略意义上修正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理解，认为世界的心脏地带应当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扩展到北极冰原地带，这种扩大的心脏地带因为拥有空中、海洋和陆地的交通便利，从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权力中心。^②

二战之后，美国继承英国成为新的全球海洋帝国，不过为了标榜美国价值的正统性，纳粹政权被看作是邪恶政权，以至于直接服务于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被看作是不道德的邪说，看作“伪科学”，以至于美国的政治战略家们回避使用这个概念，甚至一度连麦金德也不得不澄清自己与纳粹的关系。而同样兴起的大陆帝国苏联受制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将地缘政治学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产物而加以批判。由此，地缘政治学逐渐被遗忘，国际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乃是各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哲学理论，以至于人们常常将 20 世纪看作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各种“主义”之间的争夺战，看作是自由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的自由世界不但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且最终经历“冷战”而战胜共产主义。而“后冷战”

^①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② 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9 页。

以来，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人类历史理解为思想观念的历史。

尽管如此，美国不但全面继承了麦金德的思想衣钵，而且将地缘政治学发扬广大。地缘政治学说和地缘政治战略在美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在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曾经发挥的作用。二战后苏美对峙“冷战”大格局导致英美战略家都在麦金德所提供的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理论范式下思考资本主义海洋世界如何对抗社会主义大陆阵营。事实上，促成“冷战”的两个基本理论主张，无论是丘吉尔的“铁幕”理论还是凯南的“遏制”理论，本身就是基于麦金德以来的地缘政治战略构想展开的。^①凯南始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美国成长历史，并以此看待美国与苏联的关系。^②面对如何“遏制”苏联扩张这个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比如1947年，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提出了“多米诺理论”，认为苏联从大陆向边缘地带的扩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任何一个地方的成功都能引发其他地方的连锁反应。他尤其担心苏联通过中国向东南亚扩张。这种理论直接影响了美国介入越南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应对苏联的战略就要从东南亚延伸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美洲古巴、南美洲和南亚等地，在每一个地方上都与苏联展开争夺。^③

而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基辛格和布

^① 侯典芹：“传统地缘政治学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兰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② 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 索尔·科恩，前注57，第29页。

热津斯基。他们的地缘战略思考都是在麦金德的理论范式和概念体系下展开的。基辛格提出“大局观”（linkage）“将世界各地冲突地点都与苏联连接从而形成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基础，认为美国卷入任一个别冲突都需要从其对整体的超级大国均势的影响来着眼。”^①这无疑基于对“麦金德时代”争夺全球统治权这一核心问题的认同，并接受其关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理论，从而将美国的战略确定为联络边缘地带来包围心脏地带。其中最成功的战略布局就是基辛格力促美国政府与意识形态敌对的中国达成和解，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而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大棋局”理论与“大局观”理论一样，也是从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基本理论范式出发，构想美国的地缘战略。^②

虽然，196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的地理学家们重新进入地缘政治学这个领域之后，“引入了以普遍主义或整体主义世界观以及地理空间的动态性质为基础的理论。”这种理论要么强调世界是由多个权力中心构成的，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各种地缘力量之间灵活多变的动态均衡的演进关系，要么在沃勒斯坦的全球体系的理论基础上，将全球地理格局、经济关系与权力支配放在一起考察，从而强调基于经济关系的南方（穷国）与北方（富国）之间的冲突。这些新的地缘政治理论范式都试图挑战麦金德以来所确立的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范式，但是这些时髦的新理论“对冷战专家毫无吸引力，故未能进入当

^① 索尔·科恩，同上。

^②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

时流行的、被当时政治家实践同时也被媒体风光宣传传播的‘政治的’地缘政治学。”^①

冷战之后，随着苏联在地缘政治中的瓦解，美国变成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实现了麦金德“单一世界帝国”的理想。这似乎意味着宣告“麦金德时代”的结束，即二十世纪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漫长对抗终于结束，美国主导的边缘地带依靠全球商业贸易推动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力量战胜了苏联主导的心脏枢纽地带，赢得了全球的统治权。由此，“世界变成了平的”。^②麦金德以来的地缘政治学说以及与这种学说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理论一起被看作是无稽之谈。相反，在福山所主张的“历史终结”成为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导意识形态背景下，美国的胜利不是归结为地缘政治的胜利，而是归结为一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所能领悟的神秘的精神力量秉有的历史必然，麦金德强调地理、技术、资源这类唯物主义的理论被忽略掉了。这种相信价值神秘力量的唯心主义理论很快就被一种钟情于施特劳斯派的新保守主义所主导，不仅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地区寻找打击自由的敌人，而且在阿富汗、伊拉克、整个中东、亚洲开展打击“流氓国家”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尽管美国全球的军事行动包含着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但至少在主导理论上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地缘政治学说。正因如此，美国地缘战略家卡普兰才嘲笑这些迷恋思想哲学理论的唯心主义者，笑看他们如何遭到“地理的报复”。^③

^① 索尔·科恩，前注 57，第 30 页。

^② 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

^③ Robert D. Kaplan,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然而，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敏锐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争夺消失之后绝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虽然从思想观念和文化化的角度这些唯心主义的理念要素来看到全球冲突，从而将其归结的“文明的冲突”，但他对文明关注背后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考虑，因为每一个文明都聚集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空间中的，他所关注的“文明”边缘地带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恰恰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①因此，无论将美国在中亚、中东的军事行动看作是自由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还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都不可否认美国着眼于全球统治而展开的地缘战略，即通过控制中东和中亚的战略要地而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正如格瑞吉尔（Jakub J. Grygiel）所言，“地理已被忘记，而不是被征服。”^②当美国陷入中东战争，俄罗斯的军队进入车臣和乌克兰，中国迅速崛起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受到了冲击，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趋势。美国政治战略界放弃了“历史终结”的幻想，意识到这不过是“梦想终结”，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新的姿态“回归”，俄国、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会对“美国治下霸权世界”构成挑战。^③尤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过去十多年美国战略界思考的重心。然而，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美国战略界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将中国作为政治敌人发起

Fate, Random House, 2012。这本书的中译本将书名改为《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①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

② 转引自卡普兰，前注65，第44页。

③ 参见卡根：《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陈小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刘若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贸易战的时候，或许美国体现了一个世界帝国的傲慢，那就是彻底遗忘了麦金德在 1904 年“《枢纽》”演讲中结尾的预言和警告。

19 世纪晚期地理大发现终结带来的“地缘政治恐慌”不仅在影响欧洲思想家的思考，也深深地影响到卷入“麦金德时代”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大陆与海洋的对峙不仅进入到进入到晚清、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思考，而且辛亥革命从早期“反满”的民族革命到“五族共和”的国族建构也都包含了对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所处位置的思考。^①中国思想界对麦金德及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早期关注与现代中国的建构密切相关。^②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领袖虽然有明确的地缘意识和地缘战略，但政治话语完全被意识形态理论所左右，地缘政治理论难以进入主流思想，这或许与苏联思想中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精英又以“历史终结”的心态加入到英美主导的海洋世界体系中，陆地与海洋关系被抽象化为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过度，重复了 18 世纪欧洲人建构起来普遍历史的陈词滥调。^③“全球化”、“地球是平的”成为最流行的意识形态宣传，以至于在麦金德“《枢纽》”发表一百周年根本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直到中国在全球商业贸易中持续崛起并引发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讨论，特别是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再平衡”以及“印太联盟”等一

^① 详细讨论参见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未刊稿）。

^② 参见刘小枫，同前注 4。

^③ 最典型的的就是 1980 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电视论证《河殇》，以西方海洋商业文明传统来全盘否定大陆农业文明的中国文明传统。

系列地缘战略的出台，才引发中国学界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尤其中国贸易和经济利益高度全球化必然引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强大海洋运输和商业贸易需要和强大的海军，马汉的“海权”理论由此进入中国。^①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往往是作为马汉的“海权”理论对立面的“陆权”理论代表进入到中国学界的视野中，成为地缘战略的讨论话题。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马汉的理论终究不过是地缘战略之“术”，而唯有麦金德的深远历史意识才真正把握住政治地理学之“道”。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绝不能变成缺乏历史意识和文明意识的单纯外交和军事战术，而必须是把握政治地理学之道，把握自然与历史、不变与可变之间的辩证法，而这一切要从麦金德开始。在地缘政治学中，唯有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深入到形而上学的普遍世界中。麦金德试图在地理与历史之间找到人类知识的内在关联和普遍性，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试图在国家、大地与生命之间找到的内在关联。而在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中，唯有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战略与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建立对文明历史的深入思考上。若没有这些透过地理对文明历史变迁、人类普遍命运法则的思考，地缘战略之“术”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权势崛起，而是一种普遍主义文明形态的复兴。在这个意义上，普遍主义哲学思考与人类命运的全球空间视野必须携手共进，构成中国

^① 这从马汉著作的多个译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关于中国迈向海洋大国并发展海权的战略理论，参见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4年。

思想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麦金德提出的具体地缘政治战略。这些战略固然有政治利益乃至政治理想的考虑，但它始终以这些内在的法则作为前提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胜利不过是利用法则的顺势而上，而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由于违背法则逆势而行所遭受到法则的惩罚。

^① 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刘小枫先生把握住了普遍主义哲学思想与普遍主义空间历史的内在关联。他过去一些年不遗余力推动施特劳斯派的研究来激发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而最近又关注地缘政治学，关注普遍历史与普遍空间的内在关联，关注地缘政治学作为政治教育对于全球型大国的重要性。参见刘小枫，同前注 4；刘小枫，同前注 11。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背后的普遍主义哲学思考，亦参见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开放时代》，2018 年第 1 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国发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色研究领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中国人民大学优质智库资源而打造的、独立的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

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对当前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紧迫性问题进行政策与战略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形成了十大核心研究团队和十大智库产品体系，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

电 话：010-62512142
邮 箱：nads-qk@ruc.edu.cn
网 址：<http://nads.ruc.edu.cn>



思想决定命运。

研究关乎国家方向的思想问题和话语权，

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责编：杨端程